

从《故乡》到《祝福》：鲁迅“第二次绝望”的小说呈现

◎臧振东 [苏州大学文学院, 江苏 苏州 215123]

摘要: 较于《呐喊》中的小说,《彷徨》中“我”大量参与在小说中,出现了《在酒楼上》《孤独者》这样俨然鲁迅在自我对话的篇目,可见“第二次绝望”后,鲁迅更多地转向自身的绝望,进而到达《野草》。那么,从第一次绝望过渡到第二次绝望,小说中的“我”经历了怎样的精神变化,这是否可见鲁迅的精神历程?本章选取《故乡》和《祝福》进行对照分析,同样面对故乡人事,这两次的重回“故乡”之旅,究竟暗含了“我”怎样的精神变化?

关键词: 鲁迅 闰土 祥林嫂 “第二次绝望”

一、引言

虽然在两篇小说中,“我”都是一个重要角色,但却存在明显的差异。《故乡》中的“我”是一个成年人的“我”,但他在重回故乡的时候,却也在精神上回到了童年,他是以童年的回忆重新感受现在的故乡的。正是在童年回忆与故乡现实的反差中,使“我”更深刻地感受到了“故乡”的现实,感到了对这样一种现实的悲哀。他重建了对故乡的感受和认识,也重建了自己的思想和感情^①。《故乡》主要围绕“我”回到故乡并与闰土告别展开,“我”深入参与在闰土的故事中,幼时闰土的故事使得故乡在“我”的记忆中充满亮色,重逢时闰土却与“我”有了深厚的墙的隔膜;而《祝福》中的“我”可能是祥林嫂死前最后一个和她说话的人,祥林嫂的故事也通过“我”的讲述得以呈现,但“我”并未深入参与到祥林嫂的故事中,“我”更像一个游离的第三者,专为祥林嫂的死做个见证。《祝福》的特点恰恰在于:它把祥林嫂的悲剧纳入了叙述人同时并存的“有罪”与“无罪”的心理结构,非“我”的、客观的、它者的故事和悲剧成为叙述者极力摆脱的精神负担,故事的叙述过程成为叙述者力图摆脱内心压力与道德责任的潜意识的活动过程,实际上,正是这种强烈的“摆脱”意识证明了叙事人与悲剧的必然的精神联系^②。

二、“我”对闰土和祥林嫂的评价

对于闰土,“我”只用了“辛苦麻木而生活”这样既简单却又带有高度概括性的七个字,甚至闰土现在及以后生活可以继续浓缩为“麻木”二字。“我”没有对造成他麻木的丑陋的社会现实进行猛烈的批判,只在与母亲的叹息中谈及,“我”也没有细致地将闰土这些年的变化呈现于纸上,反而只选取了童年和现在代表性的场景;闰土是“我的美丽的故乡”的代名词,幼时与闰土相处的时光使“我”看到了外面的世界,使“我”的童年充满亮色,记忆中的故乡也因此美丽,“我”对故乡的回忆可以浓缩为闰土,闰土即是故乡的化身,故乡也是闰土的别号,既然闰土在“我”心中的分量如此沉重,“我”又为何顾惜笔墨,如此克制呢?

对于祥林嫂,“我”则不惜笔墨。听到祥林嫂的死讯之后,“我”不断逃避寻求解脱;因为“我”无法解答祥林嫂的问题,所以只能仓皇逃窜;对于无法解答她的问题,“我”不断给自己寻找逃避的借口,虽然仰仗“说不清暂得安慰”,但却“总觉得不安……仿佛怀着什么不祥的预感”,而祥林嫂的死则为“我”是否该对她的死负责的精神难题画上了句号。细读原文,我们会发现:“我”和其他人对于祥林嫂的死的感受是不同的,在快乐幸福的“祝福”声中,祥林嫂的死被人们嫌弃和厌恶,在未成为人们广泛交流的谈资中就匆匆地被忘却了,祥林嫂的死和鲁镇所有的苦难“全给祝福的空气一扫而空了,只觉得天地圣众歆享了牲醴和香烟,都醉醺醺的在空中蹒跚,豫备给鲁镇的人们以无限的幸福”,但这祝福不是给祥林嫂的;确实对于祥林嫂来说,在一片“祝福”声中死去是最好的选择,因为忙着“祝福”的人们因为忌讳死亡便不会再拿祥林嫂的死来做谈资,祥林嫂也就可以免去死后还要被嘲笑讥讽的厄运。

她大约因为在别人的祝福时候,感到自身的寂寞了。^③

她当时并不回答什么话,但大约非常苦闷了。^④

区别于对闰土的叙述,“我”在祥林嫂身上用到的“寂寞”“苦闷”这两个带有典型的鲁迅精神色彩的词汇,这是鲁迅在面对自身的绝望和难题时常会用到的,虽然加上了“大约”,但由此可见,“第二次绝望”^⑤已在文本中有了体现。其一,祥林嫂的不麻木于生,她的怀疑和追问“地狱”“魂灵”,使得她存在“寂寞”和“苦闷”

的可能；但这两个词由“我”说出，“大约”在表达推测的同时，也流露出“我”的精神难题，“我”的“寂寞”和“苦闷”借由祥林嫂得以发出，却也同时加深了这一苦闷：祥林嫂的死确实与“我”相关——“这一谋杀案没有真正的被告和凶手，因而全部是被告和凶手，连小说叙述者‘我’也难脱干系”^⑥——这不断地刺痛“我”的灵魂，使得“我”反抗绝望的能量由此而生。

三、与闰土 / 祥林嫂的相遇 / 告别

《故乡》中，在“我”正式与闰土见面之前，杨二嫂的出现使得“本没有什么好心绪”的“我”的心情更加糟糕，从作者对杨二嫂的描述中，也可见“我”的极度厌恶和挖苦。回到故乡，首先进入眼帘的不是变得麻木的闰土，而是变成“圆规”的杨二嫂；“我”“专为了别他”而回到故乡，虽然心中早有“悲凉”，即可能已经预计到闰土的变化，但是杨二嫂的突然出场却使得“我”尤为“无话可说”，杨二嫂的出场到底是为了暗示闰土的变化，让闰土的变化顺理成章，还是催促“我”离开的理由？答案可能都一样，“我”为了告别而回来，是注定要走的。归乡俨然是一场告别的仪式。

这次回到故乡，“我”有明确的理由：“我这次是专为了别他而来的”^⑦。他，即闰土，也可能是故乡，因为闰土俨然是故乡的化身。见到闰土，“我这时很兴奋，但不知道怎么说才好，只是说……”^⑧“我”专为别他而来，而见面时却“不知道怎么说才好”，既然“我”为别他而来，那“我”是否想象过与他再见时的场景，他 / 故乡是否曾多次出现在“我”梦中，但真正相见即告别时，“我”却“没有什么好心绪”，而至于“不知道怎么说才好”，“我”的心中是否有千言万语想要诉说，既然有话要说，却说不出口，或者说出口时已然变味，“我”又怎样“悲凉”？“我”觉出了闰土的变化，也觉出了“我”与闰土之间的隔膜；闰土变了，“我”也变了；“我”对于这变化有着深刻的认识，那“我”为何不去启蒙闰土呢？“我本没有什么好心绪”，既是已然预料到此种隔膜，“我”为了别他 / 故乡，回到故乡，“我”悲凉地带着寂寞苦楚的心绪回到故乡，如果“我”和闰土相谈甚欢，结果会影响“我”告别的姿态吗？不会的，“我”了然于胸，回来是为了告别，与闰土的隔膜既是告别的理由，也是告别的借口。从“辛苦麻木而生活”即可看出“我”的姿态高于闰土，是启蒙者，而且是不去启蒙闰土的启蒙者。在此一姿态下，很多的行动被遮蔽了，而“我”也未能完全燃烧在文本之中，不像《祝福》，作为启蒙者的“我”面对祥林嫂的三个问题居然窘迫到落荒而逃，甚至不断反省，在这个意义上，《祝福》要比《故乡》更加深刻成熟。

“我”以一副悲凉冷漠的姿态回到故乡，但只能

如此而已，因为“我”无法改变这一切，所以“我”只能以悲凉的姿态，与过去告别。可是，“我”并未有任何的尝试，即未曾试图启蒙闰土，“我”以告别的姿态回到故乡，前提早已设定，“我”又何以能不“悲凉”呢？此时的“我”尚未打破“设定的一切界限”，这其中当然也可见斧凿痕迹，即“听将令”的成分，在这里，“我”虽有告别之姿态，但尚未有自我的绝望和反抗，不过气氛已见低沉；希望与无能为力的现实之间，“我”已有彷徨的底色，但借着“听将令”勉强支持。

而在《祝福》中，“我”并没有什么回到故乡的理由，而且俨然一副局外人的姿态，自我放逐于故乡——此时故乡已成异地，于是在祥林嫂面前，“我”不遗余力地展现“我”的无能为力：“我”无法给祥林嫂以希望。

面对祥林嫂的三个问题，“我”退缩了；显然，《祝福》中的“我”的姿态已然从一个启蒙者完全变成了一个普罗大众，“我”不再具有评价闰土“辛苦麻木而生活”的高人一等，反而自觉比祥林嫂还不如，“我”与他们其实已经没什么分别，所以“我”必须要走。这时的“我”，面对“第二次绝望”，《呐喊》时期的底色已经完全丧失，只剩下“我”自己的彷徨、低语和反抗。

既然与祥林嫂的相遇使“我”不能继续在故乡安住，那“我”为何不干脆直接离开，而且苦苦讲述祥林嫂半生的故事呢？“我”千方百计地自我解释祥林嫂的死与“我”无关，“我”不断重复地说“决计离开”，这本身就暗示了“我”真实的心态：在“我”心中，“我”深深地为祥林嫂的死去感到痛苦，尽管我表面一副淡然姿态；“我”表面上不断说着“决计离开”，但“我”的心却从此住在此处，这背后有着鲁迅反抗绝望的逻辑，也有他走出“第二次绝望”的路径，但隐藏在深深的绝望和痛苦之后，使得《祝福》透露着阴森恐怖的气息。鲁迅的反抗绝望是不断地刺痛自己的灵魂，把灵魂深处的痛苦、绝望、无助做无情的解剖。

再讲到这次“我”回故乡的理由，其实无理由本身就是回乡的理由。“事实上搬家出来以后就没有回乡去过”^⑨，面对“第二次绝望”，加之近一年的没有写作，“百无聊赖”的“我”只能彷徨到故乡，去寻找走出彷徨的路径——没有明确的方向，没有明确的目的，也不知道会遇到什么，只能在彷徨中寻找走出彷徨的路——这是一次未知的挑战，也同时充满着无数突破的可能——尽管要不断地刺痛自身。

四、两篇小说的结局

《故乡》的结局拖得有点长，而且曲折缠绕，以至于消解了告别的决绝姿态。小说题为“故乡”，结尾却说到了“希望”和“路”，为了“无所谓有，无

所谓无”的“希望”，“我”必须回到故乡，然而“本来没有什么好心绪”地回来，得到的终究是隔膜，为了所爱的，却又不得不说到“路”，留下一个浅薄无分量的希望，是聊胜于无，还是强自安慰？在希望与无能为力之间，此时的“我”已开始彷徨，所以只能将希望引向“路”，曲曲折折，所谓“希望”，面相已难分辨，希望本身之意义也消磨尽，但鲁迅不能再写下去了，或有其“听将令”的原因，但“路”也像一个借口，就此停住，不再继续。这时，“我”已站在希望与绝望的交叉小径，内心矛盾又不得不行，“希望”和“路”是走一步看一步的推脱之词。

《祝福》的结局则显得“懒散而且舒适”，没有激烈的批判的言辞，也没有深切的悲哀的同情，倒有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轻松。不像《故乡》结局用“希望”和“路”缓解苦闷，《祝福》则始终围绕着“祝福”展开，“祝福”既是小说的题目，也是小说主要描述的对象、人物的生存环境，但这“祝福”是给谁的呢？这“祝福”是给鲁镇的人们的——题目所谓“祝福”，却是祝福着祥林嫂以外，而给祥林嫂以迫害的人物^⑩——但是这“祝福”也像鲁镇的人们和鲁镇的环境一样，是年复一年照旧不变的，所以这“祝福”对于鲁镇的人们来说，只是不切实际的心理安慰，根本没有疗伤的作用，反而会让人们更加麻木并且忘却痛苦，所以结尾的最后一句就像开了一个玩笑，庄重肃穆却又诙谐油滑。反而凸显出了“我”的“懒散而且舒适”，这并不是说“我”自私无情，而是看清问题之后的放松和宽慰，“我”今天就要离开鲁镇进城去了。

可以说，《祝福》更像是《故乡》的延续，《故乡》时期“我”虽有了精神上的苦闷和难题，但是鉴于“听将令”和“我”自己的“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其实更多的还是后者），“我”克制了自己，但精神的苦闷仍不可避免地溢出，于是“我”百般解释弥补几近纠缠，漏网之鱼却愈来愈多；到了《祝福》，“我”则直面精神的难题，表白于纸上，像写给自己的诉状，表面上竭尽全力为自己辩解，不遗余力地展现自己的无能为力，实际将“我”的苦闷与绝望隐于文本之后，借此实现对自身绝望的肉身和精神的三重解剖，即反抗。

五、总结

《故乡》越写越拘谨，《祝福》则越写越冷静。面对闰土，“我”更像面对着被封建传统和苦难生活压迫的麻木的众生的一个，面对祥林嫂，“我”则成了苦难众生中和他们并无二致的一个。对于闰土的辛苦麻木的活，“我”沉默不再多说；对于祥林嫂的百无聊赖的生活，“我”则细致地讲述了她绝望的每一个时刻。作为丈夫、父亲、家庭的顶梁柱，闰土可以在男人的身份下继续麻木辛苦地生活；祥林嫂则一无所有，所以她需要一个活下去的理由或借口/希望。

生而为人，任何一个微薄的希望即可以让我们继续生活，鲁迅也曾借着“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⑪的浅薄希望边缘呐喊，但结果不出所料的只剩他一个，于是陷入绝望。由此看来，《祝福》带有浓厚的鲁迅“第二次绝望”的底色，并且借由祥林嫂的悲惨遭际，“我”得以发现希望虽然可以助人逃过绝望，但是却使人麻木而无法真正战胜绝望，当绝望再次降临，除了再次援引希望，人已无力反抗。鲁迅开始书写时未必完全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但随着写作的进行，这一思路一定越来越清晰，所以《祝福》越写越冷静深刻，并且借此书写，鲁迅开始了自己更为深刻和有效地反抗绝望。当然从《故乡》到《祝福》，中间还有漫长的一段，“我”的精神难题究竟如何具体过渡，还有待细致研究。

① 王富仁：《鲁迅小说的叙事艺术（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0年第3期。

② 汪晖：《反抗绝望——鲁迅的精神结构与〈呐喊〉〈彷徨〉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40页。

③④ 鲁迅：《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页，第20页。

⑤ 汪卫东：《鲁迅的又一个“原点”——1923年的鲁迅》，《文学评论》2005年第1期。

⑥ 高远东：《现代如何“拿来”——鲁迅的思想与文学论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84页。

⑦⑧⑩ 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01页，第507页，第441页。

⑨ 周作人：《鲁迅小说里的人物》，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207页。

⑩ 李长之：《鲁迅批判》，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91页。

参考文献：

- 鲁迅.鲁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 汪晖.反抗绝望——鲁迅的精神结构与《呐喊》《彷徨》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 汪卫东.鲁迅的又一个“原点”——1923年的鲁迅[J].文学评论，2005(1).
- 王富仁.鲁迅小说的叙事艺术（上）[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0(3).
- 高远东.现代如何“拿来”——鲁迅的思想与文学论集[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1).
- 周作人.鲁迅小说里的人物[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8).
- 李长之.鲁迅批判[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

作者：臧振东，苏州大学文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编辑：赵红玉 E-mail：zhaohongyu69@126.com